本版编辑：兰文飞
E-mail：t3@studytimes.cn
Tel：010—62806237

治国理政显露轮廓

——《习近平时代》选载

□［美］熊 玠 主编

到福建省厦门市出任副市长这天，正好是习近平的32岁生日。

此时的厦门，与深圳、珠海、汕头并列为中国四大经济特区，被视为改革开放的标杆。在习近平履新一年多前的1984年2月，邓小平视察厦门，同意将厦门经济特区从2.5平方公里扩大到厦门全岛，并在厦门实行自由港政策。

1985年6月，跨越1900公里，习近平从华北腹地来到濒临台湾海峡的厦门，“我当时很踊跃地到厦门来啊，就是想来尝试对改革的实践、对开放的实践。”他说。

当时的福建，是与广东并称的改革先锋。力推改革的省委第一书记项南，被后人列为“改革八贤”之一，而这八位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勋中，也包括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项南广为人知的一句话是：要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

可以想见，水深流急却又激荡人心的改革开放，对于年轻的习近平有怎样巨大的吸引力。而担任地方正职刚刚两年的他，能够被提拔并到特区任职，也是难得的机遇。

习近平说，当时福建整体形势比他想象的要欠发达一些，从福州到厦门，一路走了8个小时，交通条件比较差，道路狭窄。而有“海上花园”之称的厦门，市容市貌显得陈旧。“美丽的厦门岛好像是一个青春少女，但是穿了一件破衣服。”

这一次升迁，习近平开始了在福建17年半的历程，从厦门副市长、宁德地委书记、福州市委书记，再到福建省委副书记，最终官至省长。在这一段对他而言最为重要的地方任职经历中，他逐级经过5个岗位，执政风格走向成熟。

“我人生中美好的青春年华是在福建度过的。”他说。

习近平在厦门担任副市长期间，曾分管农业农村工作。他提出，分管农业，首先就是要上高山，下海岛。

厦门经济特区扩容，需要制定发展战略。此事由习近平牵头，他组织了国内100多位专家教授，进行了21个专题研究，历时一年半，为厦门未来15年的发展画出蓝图。这是全国经济特区中最早编制的一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

他本人的说法是：“到特区工作，是我第一次走上市一级的领导岗位，第一次直接参与沿海发达地区的改革开放，第一次亲历城市的建设和管理。”“这3年是全面学习的过程，是一个非常艰苦、刻苦的学习过程。一是这个岗位你本来没有做过，二是特区工作谁也没有经验。可以说，双重的欠缺，在特区得到了一种补充，厦门给了我人生许多历练。”

在此期间，习近平与歌唱家彭丽媛在厦门结婚。他们只在宾馆办了一桌酒席，答谢同事好友。“晚饭后，我们4个人到他家里坐坐，到了才发现，包括他们俩平时刷牙的2个杯子在内只有4个杯子，最后只好再洗2个碗当茶杯。彭丽媛临时花5块钱到街上买了一些糖果分给大家吃。”习近平在厦门的同僚这样回忆。

小火烧温水，常烧不断火

1988年，习近平被调往宁德任地委书记。这是他的第二个“一把手”岗位。

此时的宁德，经济落后，交通闭塞，是“黄金海岸的断裂带”。9个县中有6个是贫困县，被确定为全国18个连片贫困区之一。因为经济水平在福建全省排行末尾，每次省里开会，来自宁德的干部总是坐在最后一排。

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贾庆林找习近平谈话说，宁德地区基础差，发展慢，没有实力，说话气不粗。“省委想让你到宁德去，改变那里的面貌。”当时的福建省委书记和省长也很支持和鼓励。

他不打算遵循“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惯例，而是“小火烧温水，常烧不断火，有时还添点冷水”。

急于摆脱困境的宁德干部们想要干三件大事：开发港口、修建铁路、撤地建市。习近平的想法是，经济基础薄弱，不可好高骛远，还是要按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多做一些扎扎实实打基础的工作。

到任不到3个月，习近平就走遍了9个县，后来又跑了绝大部分乡镇。

下党乡是寿宁县最边远的山区乡之一，1988年才建乡，当时无公路、无自来水、无电灯照明、无财政收入、无政府办公场所。

盛夏天气，习近平带人徒步10多公里，去这个乡调研。他们头戴草帽，肩搭毛巾，顶着炎炎烈日，在山路上走了两个多小时。路险坡陡，荆棘丛生，需要拿着柴刀劈开灌木。

这一天，乘车5个小时，步行4个半小时，开会座谈2个小时，回到县城，许多干部才发现脚底、脚趾都磨出了血泡。

习近平后来用“异常艰苦、异常难忘”来形容此次下党之行。后来在福建任内，他又两次来到这里。

习近平下乡调研，从不讲究，端起农民们递来的茶杯就喝。下乡用餐，伙食费一分不差地交给乡里。

有一年遭遇洪灾，道路被冲毁，习近平步行近13公里山路去指挥抗洪，在滑坡路段，有人要背习近平，他笑着说：“我那么年轻，怎么能让你背我呢。”

调研之后，习近平定下的执政思路是“滴水穿石”——这位33岁的地厅级干部，并未急于出“政绩”，而是展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理性和坚韧。

1988年10月，在接受《经济日报》采访时，习近平提出了“滴水穿石”的理念。后来他多次阐述，宁德这样的落后地区，发展经济只能做长期艰苦的努力，必须克服幼稚思想、急躁情绪和短期行为，努力养成在任期内留下长劲和后劲的广阔胸怀。

滴水穿石的自然景观，他在陕北插队时曾亲眼目睹，叹为观止。“一滴水，既小且弱，对付顽石，肯定粉身碎骨。它在牺牲的瞬间，虽然未能看见自身的价值和成果，但其价值和成果体现在无数水滴前仆后继的粉身碎骨之中，体现在终于穿石的成功之中。”他在文章中写道。

习近平认为，经济落后地区没有捷径可走，不可能一夜之间发生巨变，只能是渐进的，由量变到质变的，滴水穿石般的变化。

“如果我们一说起改革开放，就想马上会四方来助，八面来风，其结果，只能是多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少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如果我们一谈到经济的发展，就想到盖成高楼大厦，开办巨型工厂，为追求戏剧性的效果而淡漠了必要的基础建设意识，那终究会功者难成，时者易失！”他这样写道。

习近平离开宁德时，全区已有94%的贫困户基本解决温饱问题。1990年8月12日的《人民日报》以《宁德越过温饱线》为题对此进行了报道。

是得罪几千名干部，还是得罪几百万群众？

不过，强调渐进并不意味着缺乏果决。习近平在宁德掀起了一股反腐风暴。

20世纪80年代末，宁德干部违规占地建房成风，在狭小的市区，有些违规房建在山坡上，一排排三四层小楼，非常扎眼。民众对这些“马路边的腐败”意见很大，但如果清理违规建房，可能涉及数千名干部，人际关系复杂。

当时全地区有7392名干部营建私房，其中副县级以上的干部达242人，科级以上的干部1399人，分别占这两级干部总数的49%和46%。这组数字，与贫困地区反差强烈。

习近平决心彻底解决此事。他在地委工作会议上批评同僚中的畏难情绪：“这里有一个谁得罪谁的问题，我们是得罪几千名干部，还是得罪几百万群众？”

到1990年底，全地区共查结违法违纪占地建房干部3782人，其中处级99人，科级476人，给予经济处罚3446人，收回补罚款198.03万元。

而这一果敢作为，在1990年5月登上了《人民日报》，这张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还就此配发了评论，标题为《锲而不舍，无坚不摧》，热情洋溢地赞扬了习近平领导的宁德地委。

除了清理违规建房，习近平在宁德还重点查办了福鼎县林增团、宁德地区侨联副主席郑锡煊等腐败大案要案。

他还特别强调，要把腐败与改革中的探索严格分开，对于大胆改革、敢于开拓的干部，仍然要加以保护。

20世纪80年代末，沿海地区曾兴起下海经商热潮。习近平告诫官员：“如果觉得当干部不合算，可以辞职去经商搞实业，但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还要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官商结合必然导致官僚主义。”

在宁德，习近平还首创了官员下访制度。

上访，是中国社会生活中一种极其特殊的“政治救济”制度。民众越过底层的相关行政机关，直接向更高一级或中央的行政机关投诉各种不满。虽然通过上访而解决的问题比重有限，但这仍被视作重要的社会“减压阀”。而各省份民众到中央的上访数量，也成为考核地方的一个指标，上访越多，地方治理评价越低。

习近平则反其道而行之。1988年12月，他在宁德的霞浦县举办了第一个下访接待日。事实上，还在河北正定时，他就曾在街头摆桌子，听取民众意见。

在霞浦，习近平的第一个接待对象是县公交公司职工舒穗英。由于政府部门在她房屋旁的河边建房，导致河道淤积，洪水冲走了她家的粮食和部分财产。这名职工要求县里负责清理河道，并赔偿经济损失。

一个接待日，102名上访民众与官员面对面交流，受理问题86件，其中有12件当场解决，其余的限期一个月处理完毕。

当天的总结会上，习近平说，官员不仅要对上面负责，而且要对民众负责。“各级领导必须放下架子，打掉官气”。

“信访工作重点应该放在基层，到下面接访，把工作送上门，地区到县，县到乡，乡到村，层层下基层，把问题解决在源头，而不是把矛盾往上推。”这是习近平描绘的接访构架。

在他看来，信访下基层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民间矛盾，更可强化执政党与民众的联系——密切联系群众，一直被中共视作获得政权、赢得民心的法宝，但一些干部时有懈怠。

任福州市委书记后，习近平延续了官员下访的工作方法。1990年5月14日，上任刚刚半月，他就在福州市鼓楼区举办了“领导服务接待周”，为一名市民解决了邻里土地纠纷。此前这起纠纷已持续了半年多。

在福州，习近平提出了“马上就办”，这是他改变政府工作作风、提升政府效能的又一尝试。这四个大字，至今还挂在福州市委大院里，挂在福州市行政服务中心的大楼上，立在福建省104国道福州马尾隧道口。

习近平主政福州时的最大动作，是推动马尾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迅速发展。他不满当时的政府工作效率，提出“马尾的事，特事特办，马上就办”。

随后，这一思路扩展至福州市的所有党政部门，公务员都被要求加快工作节奏，提高办事效率。

当时他向媒体解释，“马上就办”不光是对工作效率的要求，也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要求人们审慎地做出最快反应。每个人都有这种敏感，事业才会保持年轻。

同僚评价说，虽然任福州市委书记时习近平年仅37岁，但他敢想敢干，又不咄咄逼人，做事很稳妥，不会空喊口号。

善于团结人，不是窝囊

2000年任福建省省长后，习近平提议并亲自参与组建了福建省政府顾问团，汇集各路专家作为福建的智囊——这延续了他在河北正定的做法。

习近平亲自圈点专家，不慕虚名，而是更看重那些活跃在一线、敢想能做的少壮派。

这个顾问团每年会向福建省政府提意见，习近平也经常邀请他们参加重要会议，比如经济分析会。据说，习近平很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在常委会上很少直接下结论或批评人，而是提出问题，供大家讨论，几乎没见过他说重话。

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善于团结人，是习近平的一大特点。这种领导风格和能力，在福建的17年间日益成熟，并得到认可。

在习近平看来，团结，是一个人从政立于不败之地的必然前提，他曾列举历史上的刘邦、刘秀、刘备等人，“给人的感觉是挺窝囊的那种人，但他们都有一个最大的本事，就是能团结一批有本事的人”。

他懂得整合团队的重要性，也深知盲目突出个人的弊端。在宁德的一次干部会议上，他曾以球赛作比喻，论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成功要素是整体力量的有机配合，个人的技术只是居于次要的位置，如果盲目地突出个人技术，不顾整体协调配合，往往会使总体水平下降，影响整个球队的战斗力。

在福建，习近平从一名副厅级干部升至省部级干部，行政级别上升4级，管理一个面积12.4万平方公里、3000多万人的省份——相当于三个瑞士还要多。这是他的治国理政思路逐渐成形并通过实践去印证调整的重要阶段。

福建有山有海，地形复杂，有经济特区、重要港口，也有贫困乡村、山区腹地，直接面对牵系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两岸局势紧张，几近临爆点。诸多因素，必然会加深习近平对于中国全局问题的认识、对于国家重大利益问题的思考。

面对更为复杂的执政局面，习近平提出并实践了很多新概念，比如，生态省，有限政府与效能政府，数字福建，海洋经济、林权改革，食品安全——福建成为全国第一个全面治理餐桌污染的省份。

这些举措都经过深思熟虑，在他离开福建之后，延续至浙江，有些更推广至全国。

可以说，走出正定时，他还是一个满怀理想的青年干部，而到2002年离开福建时，他已经是一位成熟稳健的政治家了。

一个坚定的有限政府论者

2002年10月，习近平调往浙江，仍出任省长，短短一个月后，又任省委书记，这是他第一次成为“封疆大吏”。

浙江在福建东北方，两省互为邻居，但经济实力差距不小——以GDP排名看，浙江在全国各省中常居第四位，而福建则总在第十一或十二位。浙江是中国面积最小的省份之一，但经济特别是民间经济的活跃程度无可匹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过去十余年居全国首位，号称“民富第一省”。

知情者透露，习近平由福建调任浙江，出乎他自己的意料。之前，他有思想准备，可能被中央调到陕西省或西部某省工作；到浙江后，“没有想到一个月以后又兼任书记，一点都没想到。当时，我想一定要做好，绝不能做不好。因为我做不好的话，不是我个人的事情，这是对浙江4600万人民的事情”。

2006年，在中央电视台的《中国经济大讲堂》节目中，习近平用“山越高越难爬，车越快越难开”形容接手这个经济强省时面对的挑战。

也有人分析说，习近平是“一个坚定的有限政府论者”，而这正好契合了他作为一个民营经济大省领导者的身份。

密集调研是习近平的基本工作方法，用他的说法是“先做学生”，“不要盲人摸象”。到任后的两个多月，在外调研的时间占了一半，每天六七点起床，夜里一两点休息。9个月之后，全省90个县市区，他跑了69个。

一次在四川当地视察浙江省的对口扶持县，因为地处高原，很多干部都支持不住，中途退了下来，而习近平不仅从头坚持到尾，更是随时随地走下汽车，走到老乡中去了解情况。

习近平常说，下基层要少搞“锦上添花”，多搞“雪中送炭”，要多跑“冷门”，到问题多、困难大、条件苦的地方去办实事。

在福建首创的下访也在浙江继续。2006年8月，他率领浙江省党政干部接访团，在衢州市接访。一上午接待了167批来访群众，当场解决问题76个。

从浙江到后来的上海，习近平有句话浙江干部耳熟能详：“领导干部下访，要到矛盾多的地方去，往矛盾‘窝’里钻，这样才能够取信于民。”

到浙江两年后，习近平面对的挑战不再是“山高车快”，而是“成长的烦恼”——市场化程度高的浙江，面临资源桎梏，电荒、钱荒、地荒、水荒；出口依存度很高，贸易摩擦加剧，打火机、皮鞋、纺织品等商品在海外屡遭制裁；生态环境压力也很大。

如果说，习近平在河北、福建任职时，相当长的时间里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温饱，那么在经济领跑中国的浙江以及上海，迎面而来的是增长方式转型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后者也是目前以及未来若干年整个中国必须完成的惊险一跃，事关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能否实现中国梦。

浙江省的办法是：与临近的上海、江苏加强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积极推动民营经济全面进入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先进制造业、基础产业和新兴服务业，清理和修订了一批限制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法规，民企与国企一视同仁，强县扩权、强镇扩权，为增长强劲的经济板块突破行政制约。

他甚至决定，对生态环境优势突出的丽水市不再考核GDP，因为“环境就是生产力，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是GDP”，力推地方走绿色生态发展之路。

他出现了，在中共领导核心酝酿调整的敏感时刻

2007年3月24日，《浙江日报》头版的“之江新语”专栏，刊出了短论《追求“慎独”的高境界》。这个专栏，习近平以“哲欣”为笔名写了4年，这是最后一篇。

当日，中央决定，习近平调任上海市委书记。

2006年秋，上海爆发社保基金案，市委书记陈良宇等一批高官落马，陈是当时查处的贪腐官员中级别最高者之一。上海，这个对中国经济和政治局势都有标杆意义的城市，会不会在风暴中动荡坠跌？

习近平主要着力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力推现代服务业，为上海确定了“四个中心”——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的目标。

对于自己的上海使命，习近平的总结是“努力稳定大局、统一思想、理顺情绪、调动干部积极性”。

短短7个月零4天，当他奉调入京时，这座城市已重获稳定和信心。

在到上海任职之前，习近平在海外的形象是改革和亲商的政治家，在国内，普通民众谈及这位地方大员，仍会提及他的中共元老父亲，对他本人印象并不深刻。调任上海，令习近平成为关注焦点，特别是在中共领导核心正酝酿调整的敏感时刻。

2007年10月中旬的中共十七大，习近平进入中共中央的9人核心领导层，与他同时“入常”的，还有他5年后的治国搭档李克强。

在中央的这5年间，习近平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受命牵头2008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筹备，并负责起草中共十八大报告、修改中共党章。直到2012年11月，成为拥有86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的总书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掌舵人。

回想2007年初，有媒体要求习近平为自己在浙江的5年打分。“我怎么可以给自己打分？打高了别人说我骄傲，打低了别人说我自卑。”习近平这样回答。

他解释说，这个分数应该由老百姓来打，官员关键是要为民做事，而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

现在，13.6亿中国人，正在注目于他的一举一动，也会在心里为他打分。

立规矩的六届六中全会

□ 高志中

在党的历史上，六届六中全会被毛泽东称之为“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这是一次进一步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地位的重要会议，也是一次立规矩的重要会议。这次全会明确要求全党做到“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通过了一系列关于党内政治纪律的规定，强调要把纪律教育作为“党的建设的一课”，对于促进党的团结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六届六中全会一系列政治纪律的制定，与此前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王明在武汉工作期间不尊重中共中央、闹独立性，有着直接的关联。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这次中央全会鉴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造成的严重后果，也鉴于王明在长江局工作期间由于闹独立性造成的不良影响，制定并通过了一系列的党内政治纪律，在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和纪律建设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毛泽东在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指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从此，这“四个服从”成了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在这次全会上，刘少奇作了关于党规党法的报告，强调：“要保证党的团结与统一，除政治上思想上之统一外，条文亦应规定法律上非团结不可，以避免个别人破坏党的团结与统一。并以此党规与党法去教育同志。”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等一系列重要文件。

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强调，每个共产党员应该爱护党和党的团结统一有如生命，认真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中央是全党最高的领导，用以严格党的纪律，使党及其各级领导机关达到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团结得如像一个人一样的程度。

全会通过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强调：“各中央委员不得在中央委员会以外对任何人发表与中央委员会决定相违反的意见，亦不得有任何相违反的行动。”“各中央委员如果没有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及中央书记处的委托不得以中央名义向党内党外发表言论与文件。”“各政治局委员除开在政治局内部及向国际控诉外，不得在党内党外对任何人发表任何与政治局决定相违反的意见，并不得有任何与政治局决定相违反的行动。”“各政治局委员未得到中央政治局之委任，个人不得用中央政治局名义或全党名义发表对内对外的言论文件。”“各中央局中央分局须完全执行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决议和指令。并不得有任何违反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文字与行动。”

全会通过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则对各级党组织的工作规则与纪律作出明确规定。例如：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代表会的代表，须无条件地执行该委员会或该代表会的决定；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代表会的代表，如果发生错误，除在该委员会或该代表会批评并向上级党委报告外，凡未经上级党委、该委员会或该代表会决定要在党内及党外公开批评时，各委员、各代表不得在口头上、报纸上、文件上向党内外任何人泄露；凡党员对于党的负责人及党在群众中的领袖有意见与批评时，除开负责地向相当的组织、党的负责人提出必要的批评外，不得随便在同志中及群众中任意品评他们的长短、错误与缺点，等等。

由此可见，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立下了许多重要的政治纪律，这对于确保党的团结统一争取抗战胜利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党风党纪